

经济增长与 物价稳定的权衡：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万光彩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经济增长与 物价稳定的权衡：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本书获安徽财经大学“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学科特区资助

经济增长与 物价稳定的权衡：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万光彩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权衡：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万光彩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1

ISBN 978 - 7 - 5141 - 8444 - 0

I. ①经… II. ①万… III. ①宏观经济 - 经济波动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3.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9837 号

责任编辑：周胜婷

责任校对：徐领柱

责任印制：邱 天

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权衡：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万光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1.25 印张 200000 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444 - 0 定价：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

前 言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平衡不仅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努力追求的政策目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阐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分析工具是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现实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不同组合，推动着学者们不断努力发展和完善总供求模型，以使其能够解释那些不同的“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并为管理层提供熨平波动的政策工具和建议。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的诞生，也促使了阐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平衡的分析工具——总需求总供给理论的建立。从萨缪尔森的 45° 线模型到希克斯的 IS—LM 模型，再到总需求曲线，作为总供求框架构件之一的总需求方程得到确定。然而作为总供求框架另一构件的总供给方程，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则是在一个叫作“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个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右上移动将导致产出的增长和物价水平的上升，而左下移动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就解释了“增长与通胀”关系中的两种组合形式：“产出增加，物价水平上升”和“产出下降，物价水平下降”。而这一理论结论的政策含义则是：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政府当局可以调控总需求水平，以达到理想的“产出与通胀”平衡。即，或者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换取就业率的上升，进而增加产出，或者牺牲就业，降低产出，从而换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滞胀”现象。而这种“产出下降，物价水平上升”的第三种“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无论是在

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给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以致命的打击。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滞胀”组合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间的交替关系，因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总供给曲线也就不攻自破；从政策实践的层面上来说，“滞胀”组合使得基于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的需求管理政策陷入两难的尴尬。通过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预期变量，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打破了这种尴尬。根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滞胀”源于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而其移动的动力是“通胀预期”的形成，因而治理“滞胀”的关键就在于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于是作为货币主义领军人物的弗里德曼，主张以“单一货币规则”来增强政策的可信性和透明度，防止公众预期紊乱。

然而当时间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被称之为“中国之谜”的“增长型通缩”现象再次对总供求模型提出了挑战。“增长型通缩”是“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中的第四种组合形式：“产出上升，物价水平下降”。如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中国的“增长与通胀”关系组合分别为：“7.8%，-0.8%”、“7.6%，-1.4%”和“9.1%，-0.8%”。并且在2009年这种“增长型通缩”现象再次发生：“8.7%，-0.7%”。因而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经典的总供求模型进行理论扩展，使其能够阐释已有三种组合的同时还能够阐释“增长型通缩”这个两次发生于中国的第四种组合。

根据实证分析方法和经济学范式思想，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意识信念、现实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将会有重要差别，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构成“范式”的核心要件。因此，要建立能够真正阐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型，必须从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理论前提假设的差别入手。

就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以及本书研究的需要而言，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尤其美国之间的差别在于：第一，中国是一个以“储蓄支撑投资，以投资扩张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而美国则是一个以“金融市场发展支撑消费，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式是“模仿式”，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式则是“原发式”；第三，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元结构。这些理论前提下的差别，

对总供求模型的影响体现在：在消费拉动增长模式下，可以忽略投资对总供给的影响，而在中国投资扩张拉动型增长模式下，不仅要考虑投资扩张的总需求影响，还应该考虑到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在原发技术进步方式下，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因而不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对总供给产生影响。

中国投资扩张拉动型增长模式，源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基础。因而本书首先从国别比较的视角，以扩充了“个人私人偏好”和引入了“个人社会价值”的新经济人模型为基础，论证了儒家文化中的节俭传统和家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因素如何导致了国别层面上的储蓄率差异。

为了将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和劳动力结构改善对总供给的影响纳入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之中，论文引入一个包含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变量的短期生产函数作为总供给方程的基础。在经过一系列数学处理之后，成功构建了“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总供求模型。

利用扩展后的模型，论文首先解释了中国通货膨胀。模型发现了投资扩张过快导致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实证证据也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轮通货膨胀中，都伴随了投资扩张速度的大幅度增加。为了论证中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因素，结合中国的二元经济特征，论文也构建一个结构性模型予以说明。通过两个模型，论文发现一旦结构性因素与投资需求拉动因素叠加，则对应着中国历次通货膨胀水平的峰值。

由于扩展后的模型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右下移动的动力机制，因而为“增长通胀”关系中的第四种组合——“增长型通缩”提供了一个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下的解释。即，正是由于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和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所导致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从而使得产出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在下降。随后的实证证据证实了这两种动力机制在中国两轮“增长型通缩”发生中的存在性。

对于理论界及政策层有关中国是否会发生“滞胀”的担忧，扩展后的模型表明，只要投资扩张的总供给效应机制和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特征的正向技术冲击，这两种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动力存在，“滞胀”就不会

发生。而至于中国 1989 年的“滞胀”，则源于“价格闯关”所导致的公众强烈通胀预期的形成，以及特殊事件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为特征的逆向供给冲击。

由于投资扩张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重要的地位，因而要熨平经济波动，维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于一个较为理想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组合状态，关键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一方面以使得投资扩张的速度合理、规模适度，不至于扩张过快造成通胀压力，也不能急剧下滑而引发通缩担忧；另一方面使得投资的方向正确，结构合理，不能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因而宏观调控也在相应的两个层次上展开：发挥国家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调控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结构；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投资扩张的规模和速度。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选题的意义	(3)
1.3 文献综述	(4)
1.4 本书结构	(11)
1.5 本书的创新及其局限	(13)
第2章 增长与通胀的权衡：理论演进及其假设条件	(15)
2.1 增长与通胀的权衡：从“大萧条”到“滞胀”	(15)
2.2 简单的生产函数：主流理论的共同假设	(19)
第3章 中国经验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24)
3.1 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24)
3.2 苏东“转型衰退”、中国“经济奇迹”与主流宏观 经济理论困境	(28)
3.3 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31)
3.4 假设条件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核心： 范式之争的启示	(33)
3.5 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三个假设条件	(36)

第4章 中国投资扩张的储蓄基础及其融资渠道	(39)
4.1 节俭传统、家族主义与经济人理性	(40)
4.2 戴蒙德模型的扩展及储蓄率决定	(44)
4.3 投资的融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57)
第5章 投资扩张、劳动力结构改善与开放条件下的总供求模型： 一个理论扩展	(63)
5.1 投资之于中国经济的再认识	(63)
5.2 投资扩张与总需求总供给：传统模型的观点	(68)
5.3 投资与总需求总供给：中国的现实	(69)
5.4 总供求模型的拓展	(73)
5.5 联立总供给方程与总需求方程	(88)
第6章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模型的应用	(92)
6.1 “滞胀”与“增长型通缩”的形成机制	(92)
6.2 中国式通胀	(96)
6.3 增长型通货紧缩	(112)
6.4 中国会发生“滞胀”吗？	(123)
第7章 增长与通胀的权衡：传统政策组合与新常态下的货币 政策框架调整	(127)
7.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	(128)
7.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136)
7.3 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	(144)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156)
参考文献	(159)
后记	(171)

第1章 导论

在宏观经济学最近三十年的发展中，考虑微观基础虽然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以此为基础的宏观模型并没有比最简单的模型更精确。具备了代表性个体理性行为基础的总供给研究并没有替代菲利普斯曲线，消费的跨时期模型也没有为总需求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保罗·克鲁格曼

1.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trade-off）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而推动这一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是现实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并由此导致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巨大发展。而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权衡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则是这门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内容。

从萨缪尔森的45°线模型到希克斯的IS—LM模型，再到总需求曲线，作为总需求总供给框架构件之一的总需求方程得到确定。然而作为总需求总供给框架另一构件的总供给方程，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则是在一个叫做“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这个“菲利普斯曲线”则仅仅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研究英国1861~1957年工资时，发现的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反向关系的一个统计规律。在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个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总需求的波动导致产出和物价水平的波动，而总供给基本上是稳定

的。即，总需求曲线的右上移动将导致产出的增长和物价水平的上升，而总需求曲线的左下移动将导致产出的下降和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一理论结论的政策含义则是：政策制定者通过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总需求水平，以达到想要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组合，即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换取失业率的下降，并进而增加产出，或者以失业率的增加来降低产出，从而换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滞胀”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给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以致命的打击。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滞胀”的出现摧毁了作为总供给曲线理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间的交替关系，因而建立其上的总供给曲线也就不攻自破；而从政策实践的层面上来说，“滞胀”使得基于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的需求管理政策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为了阐释并治理“滞胀”，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通过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预期因素，从而修正了凯恩斯主义的总供求模型。在这个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传统菲利普斯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交替关系仍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短期内，而长期中这种替代关系则不存在。根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产出和物价水平的波动不仅仅源于总需求波动，还可能源于总供给因素。而“滞胀”的发生，就是因为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的结果。推动总供给曲线左上移动的动力则源于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形成，因而治理“滞胀”的关键就在于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于是作为货币主义领军人物的弗里德曼，主张以“单一货币规则”来增强政策的可信性和透明度，防止公众预期紊乱。

然而，当时间进入世纪之交时，一个被称之为“中国之谜”的“增长型通缩”经济现象再次对阐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权衡的总供求理论提出了挑战。从 1998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较长的通货紧缩周期，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不同，中国在通货紧缩期间，产出增长率却仍然维持在高位运行，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所揭示的通货紧缩伴随着产出的下降。在世纪之交的 1998 年、1999 年及 2002 年，我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0.8% 、 -1.4% 、 -0.8% ，而产出增长率则分别高达： 7.8% 、 7.6% 、 9.1% 。10 年之后的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增长型通缩”再次出

现。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产出增长率高达8.7%,但通货膨胀率却为-0.7%,与2002年的宏观经济特征非常接近。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这种“增长型通缩”之谜,不但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无法解释,即使是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总供求模型也无能为力。因为在以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总供求模型中,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形成是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的动力,但是模型并没有能够提供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机制。那么中国的这种“增长型通缩”之谜还能够在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下进行阐释吗?如果能够阐释,那么需要怎样的修正呢?中国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推动力量到底源于什么?中国的总供给曲线会向左上方移动吗?

1.2 选题的意义

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是宏观经济学中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与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一样,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也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新的经验事实无法以原有的理论合理阐释时,新的经验事实往往会被冠以“某某奇迹”或“某某之谜”的称谓。那么这时就应该是对原有的理论进行重新检验的时候,要么拓展或修正原有的理论,使其能够在证伪过程中与新的经验事实逻辑一致而并行不悖,要么就是新的经验事实彻底否定原有的理论而诞生一种新的理论。因此,本书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验事实为前提条件,扩展现有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对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如何借鉴实证研究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理论的有益探索,也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而进行新的理论阐释的尝试。这是本选题的理论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和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不断加深,从而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刚刚经历一次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调控,并正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恶化背景下的

宏观经济紧缩。阐释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影响的传导机制以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理论机制，对如何更加有效地稳定宏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就是本选题的实际意义。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方面

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现象，一般包括物价波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出波动（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和就业波动（充分就业或失业率上升）。由于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因而在古典主义者那里，价格波动源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同时由于价格波动具有完全弹性，市场能够迅速出清，从而价格波动与产出波动相互独立，而产出是由诸如劳动（就业）、资本存量以及技术进步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因而在古典主义者那里，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无法也无须干预经济波动。

然而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面前，古典主义经济学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因为它无法解释像“大萧条”这样剧烈的宏观经济波动（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2000）。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样悲剧性的宏观经济波动，却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开启了大门。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和价格完全弹性不同，凯恩斯以工资价格刚性为前提，因而劳动市场无法出清而存在非自愿失业。人们心理上的各种倾向和预期的波动（如，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流动偏好的不稳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产出在短期取决于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因而私人部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时，将导致产出的萎缩，并在乘数作用下使得经济加速下滑。因而在凯恩斯那里，政府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使宏观经济走出通胀或通缩的阴影。如通过增加政府的需求以弥

补私人需求的萎缩，并在政府支出乘数的作用下使得私人需求得到多倍的扩张，进而使得经济走向繁荣。凯恩斯的这种以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的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被希克斯（Hicks，1937）综合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IS—LM模型。这个只考虑产出波动的IS—LM模型为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熨平产出波动。然而，IS—LM模型同时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扩张将产出控制在自己希望的水平上，而无须担心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这显然与经验事实不符。因而尽管凯恩斯本人宣称“长期中我们都死亡了”，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还是应该考虑价格在长期内应该是能够调整的，尽管其调整速度比较缓慢。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综合派研究宏观经济波动时，既不能像古典主义者那样仅仅考虑价格波动，也不能像希克斯—汉森模型那样仅仅考虑产出波动，而是同时考虑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当价格能够调整时，产出就不再仅仅是由总需求决定，而必须考虑总供给。也就是说总需求总供给共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产出和价格，或者说产出和价格波动源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这个综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古典供给理论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标志性成就，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这个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促进产出增长，治理经济衰退的同时，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将是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代价。这与IS—LM模型所揭示的问题的相比，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意味着政府无法将产出提高到自己任意希望的水平上，因而产出的增加受制于价格波动的约束。那么政府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增加产出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痛苦呢？通过将古典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水平的总供给以及传统菲利普斯为基础的右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整合在一起，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一旦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将总需求推向古典区域，则其结果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产出的增长。而在古典区域和凯恩斯区域之间，根据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Phillips，1958），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一个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组合，或者以失业率的上升换取通货膨胀率下降，或是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换取失业率的下降。

当凯恩斯主义者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深信不疑时，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种新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滞胀”，动摇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信奉。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滞胀”为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反革命提供了契机。因为“滞胀”的发生否定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交替的关系，这在经验事实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熨平宏观经济波动能力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Snowdon and Vane, 2000）。弗里德曼（Friedman, 1968）和费尔普斯（Phelps, 1967）以自然率假设和适应性预期为前提，导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而否定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修正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附加预期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在推高产出和物价的同时，将导致公众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而一旦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则将推动短期总供给曲线左上移动，这使得物价水平继续走高的同时产出却下降，这就解释了“滞胀”这种宏观经济波动。

在现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上，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整合了货币主义的理论思想，形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综合，而“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则是这种综合的杰出成果（Dornbusch, 2000）。在这个动态模型中，预期变化导致的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产生“滞胀”，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上升导致通胀。因而这个“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充分体现“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也说明了温和的通货膨胀源于劳动力市场。

尽管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于由 IS—LM 模型基础上导出的总需求曲线及其相关的总需求理论（包括开放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没有什么争议，对总供给曲线长期垂直而短期右上倾斜也达成了共识。但对于短期总供给曲线右上倾斜的解释及其相关的总供给理论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以至于成为宏观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Dornbusch, 2000），对总供给曲线及其相关理论的不同理解甚至可以成为划分宏观经济学中不同流派的根据。

根据未预期到的物价水平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相互影响的不同机制,新古典综合派之后的总供给理论可以总结为四种不同总供给模型(Mankiw, 2000)。

尽管有关总供给理论的四个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总产出波动与物价水平波动之间相联系的一个特殊原因,都有各自的理论思路,但每一个模型都在同一个地方结束,即总供给曲线在短期内向右上倾斜,而长期内垂直于横轴。这些方法不同但结论一致的总供给理论,再加上以IS—LM模型为基础的总需求理论所构成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是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分析工具。在这个框架的持续构建过程中,理论思想与现实经验的相互促进使得它能够解释自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所有宏观经济波动。如关于产出的波动:从总需求方面看,拉动产出增长有“三驾马车”;而在总供给方面,就业的变动与产出之间存在“奥肯定律”。而关于物价水平波动方面,通货膨胀可能源于需求拉动也可能源于成本推动,并在预期的作用下存在“惯性”。至于产出波动与物价水平波动的关系方面,既可能存在短期内的“此消彼长”关系,即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换取失业率的下降,进而增加产出,或者以失业率增加降低产出从而换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可能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推动总供给曲线左上移动而导致“滞胀”发生。

1.3.2 国内研究方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被广泛引进和运用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之中,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因而也成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基于国外总需求总供给理论的前提下,我国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从理论拓展方面讲,胡乃武、郑超愚(1994)采用非均衡体系,使用短边规则技术进行均衡分析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我国的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进而通过二者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态势。与传统总需求总供给理论不同,他们将总需求水平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产出效应和供给效应,前者是指总需求变动所引致的总供给沿既定总供给曲线的变化,后者是指总